



日本天皇更替时期中国“对天皇外交”： 必要性、可行性与具体策略

程文, 李乾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沈阳 110136)

摘要: 2017年12月1日,日本皇室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时任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次日德仁皇太子作为新天皇继位,这意味着日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天皇更替时期。文章以此为背景,从战后日本的“天皇外交”和“皇室外交”出发,提出“对天皇外交”,即以中国为主体开展对日本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的外交活动和外事行为,并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在这一天皇更替的有利历史时期,中国在“对天皇外交”方面应实施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 日本政治;“对天皇外交”;中日关系;外交策略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6-0281-08

"China's diplomac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succession in Japan: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CHENG Wen, LI Q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On December 1st, 2017, the Royal Conference of Japan officially decided that Emperor Akihito would abdicate on April 30th, 2019, and Prince Naruhito would take the throne as the new emperor on the next day. This means that Japan is going to enter a new era of emperor succession. Based on such background, starting from the "Japanese emperor diplomacy" and the "royal family diplomac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iplomac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that is, take China as the main body to carry out diplomatic activities and foreign affairs for the Japanese royal couple and the crown prince couple. The paper then analy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diplomac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in the advantageous historical period of emperor succession.

Key words: Japanese politics; diplomac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iplomatic strategies

2016年7月14日,日本明仁天皇绕过宫内厅,通过NHK电视台向国民表明了自己生前退位的愿望,这一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被动地考虑对策。2017年6月9日,《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在参议院全

票通过,天皇生前退位的愿望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同年12月1日,日本皇室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时任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次日德仁皇太子作为新天皇即位。至此,从2016年7月开始的天皇退位风波,历时一年半终于平息。

根据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被剥夺

收稿日期: 2018-10-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程文(1974—),男,辽宁锦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政治方面的研究。

了一切政治权利,仅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不过其在形式上仍然具有国家元首的地位。“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它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天皇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但其作为日本国家的最高代表,仍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一次日本天皇的更替,世界主要国家都会表示一定程度的关注,而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更需对此保持高度的重视。

由于形式的隐蔽性和事件的稀缺性(仅明仁天皇于1992年访问中国一次),国内学者对于天皇外交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都从范式与作用出发,如张敏^[2]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并探析天皇外交的“访美范式”,指出天皇外交这一范式的作用和稳定性;吕耀东等^[3]从天皇慰灵外交的起源、目的及内在问题着手,讨论这一范式的实效及弊端;而站在中国角度进行应对分析的研究微乎其微。另外,针对某一具体外交事件的研究通常时效性较强,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天皇外交及其应对措施的相关研究集中在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前后,之后对此问题的探讨寥寥无几。笔者认为,中国学者不应忽视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尤其是类似新天皇访华这种具有先例且能进行一定分析预测的事件,更不能等到已然发生再做讨论。本文从中国外交实践出发,通过现状认识和历史借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希望针对“对天皇外交”提出切实可行的外交策略。

一、“天皇更替期”的时间界定及“对天皇外交”的提出

日本天皇一直以来都是逝后传位,从前的皇位更替自然也没有明确的可预见的时间。明仁天皇选择生前退位而非逝后传位,由此产生了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皇位更替期”。关于日本“皇位更替期”这一时间段的界定,其起点毋庸置疑。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通过NHK电视台正式宣布生前退位的决定,从此拉开了皇位更替的大幕。而这一时间段的终点,从外交角度出发,主要以新任元首稳定国内形势后能够进行对外访问为标志。以同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英国为例,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52年2月6日登基,1953年6月2月加冕成为女王,到进行第一次正式出访(1955年4月24日访问挪威)之前,中间有三年多的过渡时期^[4]。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明仁天皇于1989年1月即位,而他第一次正式出访是在近三年后的1991年9月访问

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考虑到天皇即位后适应与稳定国内环境的需要,有近三年的时间差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新天皇德仁就任(2019年5月)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综上所述,本文将这一皇位更替期定为2016年至2022年。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日本国宪法》的约束下,天皇的外交权受到了一定限制,不具有缔约权和使节权等,但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却依旧不可小视。二战以来,日本通过开展以“和平亲善”为旗号的“天皇外交”和“皇室外交”,在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博取国际理解、开拓海外市场、走向政治大国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用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成果,对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进行了有力的补充。

所谓“皇室外交”,指的是由皇室成员进行的外交活动和所表现出的外事行为,这些成员应包括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皇弟和他们自己的配偶与后裔,而二战后日本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进行的外交行为和外事活动,则是狭义上的皇室外交^[5]。同时,也有学者使用“天皇外交”一词,把行使活动的主体仅限于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6]。可见无论是“天皇外交”还是“皇室外交”,在使用时都对各自的主体进行了范围上的限定,范围过大会增加非关键因素,使集中度降低;范围过小则难免会遗漏重要人物。因此这两个词的含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为皇室核心成员所开展的外交活动和外事行为,故在此统一称作“天皇外交”。

需要注意的是,“天皇外交”是从日本角度出发的外交活动,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在天皇依然具有重要外交作用的情况下,应开展具有特定方向性的“对天皇外交”,即中国对日本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和外事行为,包括定期拜会、参加即位典礼、积极宣传等。特别是在此日本皇位更替期,如何抓住时机,针对在外交上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天皇,展开新的“对天皇外交”,争取外交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天皇外交”的必要性

(一)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中日关系历经波折起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冷经热”逐渐转变为“政冷经冷”的状态,尤其是钓鱼岛问题和安倍政府执意修改宪法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安倍晋三于2017年11月1日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些转机。同年11月11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两人就加强互信、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尽可能实现互访等达成了一系列共识^[7]；2018年1月27日至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应邀访华，表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希望双方首脑借此契机重新启动互访机制以全面改善两国关系^[8]；5月9日，李克强总理访日，与安倍首相再一次就首脑互访达成一致^[9]。不论安倍在表示友善的背后有何动机，对于双方来说友好的中日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导致在任的中日两国领导人从未进行过官方互访，这种严峻局面不是短时间能够破解的，中日关系回到正轨仍然任重道远。

明仁天皇宣告退位及皇太子即将继位的现实，为改善目前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日本明仁天皇在华进行正式访问，成为中日交往史上日本天皇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明仁天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华访问的日本天皇。这次访华，不仅打破了中国当时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局面，对改善中日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大增强了两国的交流与互信。日本政府当时也表示，“天皇、皇后两位陛下的成功访问，使日中两国民间的传统友好和亲善关系更上一层楼，为将来两国国民友好和亲善关系进一步深化打下了良好基础。”^[10]因此，2019年5月1日德仁皇太子的继位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机遇。对中国而言，积极开展“对天皇外交”，促成以新天皇的访华为核心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有利于协调和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同时可以占据外交上的主动权，打开中日关系的新局面。

（二）稳定周边环境的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且周边国家的文化、宗教、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对华政策和关系的差异很大，这是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区域或地区的现实状况。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问题基本可以分为两类：领土争端和朝鲜半岛问题。21世纪以来，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频发，如中印边界争端、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也随着朝鲜核试验的一步步推进而日益严峻。总的来说，中国周边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很大，需要各方协调共同解决。

他国的外交智慧与策略，整体来看基本以“硬”手段（政治、军事）为主，起初略有成效，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对于领土问题的强行命名、占领和对于

朝鲜半岛问题的一系列制裁与威吓，非但没有使争议缓解，反而有加剧的态势。中国则不同，对于领土问题确保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实行“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提倡发挥“六方会谈”的作用，并提出了“双暂停”与“双轨并行”的策略。这一系列举措都收获了较好的效果与较高的国际评价。2018年平昌冬奥会伊始，朝韩双方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与体育外交，乃至后来的《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繁荣、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等，都使得两国关系大大缓和，这更加促使我们思考在当下地区环境中使用“软”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日本天皇以日本国家和国民象征的身份进行的各项外事活动，无疑具有超越首相、外务省的影响力和宣传作用。对于1992年明仁天皇的首次访华，作为继访欧、访美和访东南亚之后日本天皇战后的第四次出访，有学者曾指出其实际意义并不大，但却具有非同凡响的象征意义^[11]。日本一直是中国周边环境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通过开展天皇更替时期的“对天皇外交”，推动改善中日关系，对于稳定周边局势无疑大有裨益。同时，积极参加即位典礼等形式的“对天皇外交”，也是加强与周边国家沟通的良好渠道。另外，若能实现新天皇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对周边甚至全球释放一种和平与善意的信号。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积极促成新天皇访华等“对天皇外交”手段和其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寄予较高的期待。

（三）牵制日本右翼的需要

日本右翼势力主要指日本政治势力中的鹰派，也就是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其特点包括鼓吹“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否认侵略战争和美化侵略历史，大肆宣扬“种族优秀论”等。以安倍为首的右翼势力自掌握政权以来，做出了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问题、修改历史教科书，甚至购买钓鱼岛等许多严重伤害周边国家感情和利益的行为。对于日本右翼的一系列举动，从“对天皇外交”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找到从日本国内进行牵制的方法。

2017年春，明仁天皇提出退位的要求，引起安倍领导的保守政府的强烈不满。然而，在参议院表决允许天皇生前退位的“特例法”时，却罕见地出现了235票全票赞成通过的局面^[12]。这反映出天皇虽然并无实权，但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官员仍必须尊重天皇的主张和意愿。明仁天皇的退位原因表面上看他年事已高无力任职，实际上与同安倍右翼势

力的冲突不无关系。作为和平宪法的坚定拥护者,明仁天皇虽不支持安倍政府修改宪法,但因体制所限无权正式表达政治主张,便绕过宫内厅通过NHK电视台和生日讲话表明自己的立场。无疑,这对安倍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阻挠。这次“退位风波”除了拖延修宪进程、避免天皇做安倍的政治棋子之外,也是天皇对右翼势力的一次绝妙反击。即将继位的德仁皇太子为人谨慎,并无对华不友好的言行,且他同父亲一样是和平宪法的支持者。另外,对于明仁天皇的访华,曾经致力于推动此事的官员表示:“反对中日友好的势力依然存在,天皇访华的实现使反中势力失去了反对中日友好的根据,并使得中日友好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3]因此,在天

皇更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主动开展“对天皇外交”、积极与新任天皇处理好关系是必要的,对于牵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意义重大。

三、“对天皇外交”的可行性

(一)绝佳的历史时期

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明仁天皇访华是“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政府间活动”^{[14]427},可见两国交往过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对于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本次天皇更替可谓是正值绝佳的历史时期,对期间的重要事件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本次天皇更替时期的重要事件

| 时间 | 事件 |
|-------------|-----------------------------|
| 2016年8月8日 | 明仁天皇通过NHK电视台正式宣布生前退位的决定 |
| 2017年6月9日 | 《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在参议院全票通过 |
| 2017年9月29日 | 《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
| 2018年5月7日 |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签订10周年 |
| 2018年8月12日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
| 2018年11月25日 | 《中日联合宣言》签订20周年 |
| 2019年4月30日 | 明仁天皇退位 |
| 2019年5月1日 | 德仁皇太子即位 |
| 2020年7月24日 | 东京奥运会 |
| 2022年2月20日 | 北京冬奥会 |
| 2022年9月29日 | 《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16—2022年这一时间段内,不仅有四个中日之间重要政治文件的签订纪念日,同时还有两场重大的体育盛事,这些都是开展“对天皇外交”等外交工作的绝佳机会。笔者大胆预言,如若一切顺利,新天皇访华的最佳时间将为2022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新天皇2019年即位,三年时间足以安定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并开展一系列外交工作;其次,继一系列两国间重大纪念日与活动的铺垫后,2022年是《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与明仁天皇访华有相似的时代背景;最后,2022年正值明仁天皇访华30周年,借此机会实现历史上第二次日本天皇访华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二)天皇家族的和平观念

中国得以开展“对天皇外交”的另一重要因素则在于天皇家族自身。当今的天皇明仁以及即将继位的皇太子德仁,均是坚定维护《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对日本右翼势力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满,这种和平友好的观念正是“对天皇外交”能够实

施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明仁天皇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和平的拥护由来已久,这与现在大肆推动右翼势力扩张的首相安倍晋三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他选择生前退位,以表达对安倍修宪的不满和对和平宪法的拥护。而即将于2019年继位为新天皇的皇太子德仁,虽没有公开表示过对战争的反省,但亦没有出格的言行,其本人在多种场合下表达过对于和平宪法的拥护。在2014年的生日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皇室活动与政治的关系,德仁答道:“现在的日本是以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并持续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今后我也将站在遵守宪法的立场上,听取必要的建言来展开活动。”^[15]此外,德仁皇太子不仅对中国有着充分的了解,更十分关心中日友好事业。据曾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回忆,德仁曾参观过世博会中国馆,欣赏过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他“聪颖好学,谦和朴实,待人诚恳,对历史文化、水运交通、音乐、体育等有广泛兴趣,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也颇为关心”^[16]。在2017年联合国召开的

水与灾害特别会议上,德仁在主旨演讲中对中国6月份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水灾等表示了深切同情,并举日本信玄堤和中国都江堰等为例,谈了自己在治水方面的建议^[17],其对中国了解以及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三)日本政府改善经济环境的需要

近年来,日本经济形势较为低迷,经济增速相对缓慢,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经济稳步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促进经济形势向好发展的手段。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日本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是很消极的,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落实与有序推进,日本政府感到若是一味沉寂下去,可能会丧失开展合作的诸多宝贵机会。于是,在中日关系持续冷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通过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积极信号,意在实现某种转圜,从而达成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2017年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在‘一带一路’构想下,在印度洋诸国支援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扩大地区影响力之外,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等地区的作战执行能力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18]而2018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中国军队通过海道防卫等措施,存在着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后盾作用的可能性。”^[19]另外,2017年以来安倍晋三也曾多次表示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例如,在第二十三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的晚餐会上,安倍发表讲话,表示“充分吸收国际社会的共同想法,‘一带一路’构想将与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的经济圈进行高质量的融合,期待这一构想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日方将从这一角度出发考虑进行协助。”^[20]

可见,迫于改善经济现状的压力,日本政府急于缓和中日关系,从而促进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改善日本的经济环境。2018年以来,随着河野太郎访华、李克强访日、安倍访华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日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同时也必须看到,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说,积极推动天皇访华无疑将会大大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进程,从而使日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事务中去,以促进其经济发展。

四、“对天皇外交”的具体策略

(一)积极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

天皇的即位典礼是日本最为庄重盛大的典礼之

一,对于中国来说其重大意义不只在于日本国内的皇位更替,同时也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1990年11月12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在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皇宫举行即位典礼,正式宣告继承皇位。典礼上高层荟萃,政要云集。以海部俊树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成员集体参加,同时世界158个国家的元首、总理和政府代表应邀参加并表示祝贺。中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专程前往参加,驻日大使杨振亚也同夫人和各国使节夫妇一起应邀参加。参加典礼的共计2500多人^[21]。在为期三天的典礼过程中,吴学谦副总理会见了各国政要并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海部俊树首相的会晤。这次会晤中,双方在中日友好、经贸合作、人员往来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进一步打破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与制裁,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

此外,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日本内阁决定于2月24日为天皇逝世举行盛大国葬,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吊唁外交”^{[14]381}。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此积极做出反应,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派出代表参加,其中元首、总理级55人。中国委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参加天皇葬礼,他在与各国领导人频繁接触的同时,得到了竹下登首相的破例单独会见^①。通过会谈,竹下首相修正了对过去战争的说法,明确表示战争给邻国带来了重大伤害,日本侵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14]381}。钱其琛特使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与成果,被各大日媒认为是“中国外交的胜利”^[22]。

由此可见,包括即位典礼和葬礼等形式的“典礼外交”可以说是“对天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2019年5月1日德仁皇太子的继位,日本政府必将举行盛大的即位典礼并广泛邀请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前去参加。对此,中国应积极响应,派遣高级别、熟悉日本国情和中日关系的官员前往参加典礼,对新天皇的继位表示祝贺,并于在日期间积极同日方首相等高级别人员及他国代表展开会晤,这势必会取得较为丰厚的外交成果。同时,可以努力争取日本媒体的宣传,增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好感,由此加深两国及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互信。

^① 所谓破例是指依照最初计划竹下首相只单独会见元首级贵宾,此举意在表示对中日关系的重视。

(二)积极推动新天皇访华

推动新天皇访华是开展“对天外交”的核心。1992年10月明仁天皇访华,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日本天皇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在这次完美落幕且意义重大的访问背后,有着大量的政治铺垫与利益交锋。认真研究前次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新天皇访华有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加强同新天皇的交流,了解新天皇的访华意向。推动天皇访华,最重要的一点是天皇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裕仁天皇在1989年逝世前就曾多次流露出希望访问中国的心意,数次表示若能访华将“感到很高兴”,但因为日本政府认为此事太敏感,最终未能成行^[11]。1992年明仁天皇的成功访问,与其自身强烈的访华意愿也是分不开的。198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访日,在与明仁天皇会见之时,天皇明确表示日本和中国关系深厚,务必要去一次中国;随后在一次记者会上,他又一次表明想要访华的意愿^[23]。即将继位的德仁皇太子同父亲一样是和平宪法的拥护者,并对右翼颇有微词。因此,及时准确地了解新天皇的访华意向,是推动天皇访华的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

其次,积极邀请新天皇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中国政府便向日方发出了希望天皇访华的邀请;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在会见裕仁天皇时再次向他发出访华邀请。虽然这些努力最终没有实现,却向日方表示了中方对于建设两国关系的态度和诚意。明仁天皇登基后,中国先后共进行了8次正式邀请。1992年4月,对日本进行访问的江泽民总书记当面向明仁天皇夫妇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同年10月实现了这一历史盛举。德仁皇太子继位的2019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前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点和机遇期。在此基础上,中方派出要员访日进行邀请,无疑会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最后,努力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和沟通,解决双方敏感问题。早在裕仁天皇有意访华之时,日本政府的态度就相当谨慎,每次谈及天皇访华之事都要求中方不要对此做出公开报道。后来关于明仁天皇的访华事宜,本是中日两国经过长期协商共同达成的意向,由于日本国内存在担心天皇被政治利用的声音,尤其右翼势力认为这是“一种下跪的外交政策”而强烈反对,使得真正成行大为推延^[24]。明仁

天皇在出访前也曾表示:“我认为,我的立场是依照政府的决定,在其中尽最大努力。”^[25]站在中方的立场上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会尽一切可能消除日本政府的不安。对于邀请新天皇访华,由于拥有上次成功的历史经验,阻力可能会相对变小一些,但仍必须积极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和沟通,努力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以下几点原则应向日本政府传达清楚:第一,中方尊重天皇对于日本国家和国民来说的重要地位,邀请天皇访华绝非所谓的“朝圣外交”,目的绝不是某些右翼分子所说的“小日本屈服于大中国”;第二,中方尊重日本国宪法,充分了解在宪法框架下天皇无法干预政事的要求,邀请天皇只为和平友好而来,绝非利用天皇达成政治目的,绝不用战争罪行等话题为难天皇;第三,绝对确保天皇访华行程中的安全,1992年的成功访华就建立在这一重要基础之上,宫泽首相在事后曾经表示,“让我对天皇访中下定决心的是,中国领导人承诺‘绝对保证安全’”^[26]。另一方面,对于推动明仁天皇访华一事,在中方已做到“仁至义尽”之时,日本政府仍未作答复,由此中方便决定不再提及此事。这引起了日方的重视与担忧,进而宫泽首相力促天皇访华^[11]。因此,中方也应软硬兼施,使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与日本政府进行周旋。

(三)肯定明仁天皇功绩

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12月23日,于1989年1月7日登基,是日本第125代天皇。在位期间,明仁天皇除成功访华之外,还积极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他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对过去的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早在2005年明仁天皇72岁生日会见记者时,他就表示了对战争的批判:“从昭和之初至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终战,日本无日宁日。愿今后在更多人的努力下,正确地去认识过去的历史。”^[27]2015年,在日本每年例行举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首相安倍晋三的致辞中只字未提此前历任首相都曾表明对亚洲诸国的加害责任和反省,而明仁天皇则表示“在回顾过去,对之前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殷切地盼望战争惨祸不再发生”^[28]。因此,对于即将退位的明仁天皇,中方应作出肯定的评价,并进行适宜的和平宣传。

一方面,在明仁天皇退位后,定期派遣官员对天皇进行访问和拜会,肯定评价天皇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积极在日本国内塑造中日友好的氛围,占据外交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国内某些对天皇的偏颇认识和误解,国家主流媒体应

借机进行相应宣传,详述明仁天皇的功绩,多做正面的报道,为开展一系列“对天皇外交”营造良好的国内舆论环境。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后,时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宁新在日本新闻协会的杂志《新闻研究》(1993年1月号)上发表的论文中曾提到:“总之,促进天皇访华的实现、保证访问的成功是这一阶段大众传媒报道的出发点。”^[29]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7年12月1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被问及“日本明仁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明仁天皇是首位访问中国的天皇。中方对明仁天皇如何评价?对他退位有何看法?”之时,曾回答道:“明仁天皇曾于1992年访华,并多次会见过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30]

(四)开展“对天皇外交”的注意事项

对于开展“对天皇外交”,还有一些“陷阱”必须注意。

第一,日本宪法明确限制了天皇的政治权力,以天皇为核心开展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是钻了日本宪法的空子,是一种“违宪行为”^[31]。日本右翼在默许该种外交形式的背后,是否有借此打开和平宪法缺口的意图,这一点不得不防。因此,在积极开展“对天皇外交”的同时,应对此加以关注。

第二,必须注意,天皇外交并非日本的官方外交。天皇可以象征日本,但不能在外交上代表日本,日本的官方外交依然是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的,天皇外交只是一种补充。因此,处理好两种外交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天皇的出访必须得到日本内阁和宫内厅的首肯,也就是说,天皇的访问必然满足了右翼政府的某些需求,因而才能成行。另外,天皇外交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隐蔽性,天皇真心和平亲善的背后亦有可能潜藏着日本外务省的其他动机。对于这种“一退一进”的外交手段,中国在开展“对天皇外交”之时务必保持清醒,仔细分析决策,认清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

五、结 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天皇更替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应对开展“对天皇外交”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不仅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还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稳定周边环境,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开展“对天皇外交”,争取天皇和日本国民,能够有效地孤立和牵制安倍右翼势力。作为传

统外交形式的一种补充,这也是扩展中国外交手段和渠道、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对天皇外交”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推动新天皇访华和肯定明仁天皇功绩。其中,参加新天皇即位典礼和肯定明仁天皇功绩是铺垫性、基础性的举措,而推动新天皇访华才是“对天皇外交”的核心所在。另外,在开展一系列“对天皇外交”的行动时,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图谋也必须加以提防。

“对天皇外交”的前提在于天皇家族的和平观念,基础在于天皇作为象征元首仍然存在的外交影响力,根源则在于中日两国相向而行共同发展的历史趋势。现在,这一外交形式的作用将在天皇更替的特殊时期会被进一步放大,如若操作得当,则很可能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参考文献:

- [1] 王德祥. 对国家元首制度的比较研究[J]. 现代法学, 1981(4):34-37.
- [2] 张敏.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J]. 日本问题研究, 2016(4):19-26.
- [3] 吕耀东, 谢若初. 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J]. 日本问题研究, 2017(5):1-9.
- [4] The Royal Family. Outbound state visits since 1952 [EB/OL]. (2018-01-23) [2018-11-25]. https://www.royal.uk/sites/default/files/media/outbound__state_visits_since_1952_0.pdf.
- [5] 张茜红. 论二战后日本的皇室外交[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6):42-46.
- [6] 赵茜. 日本在走向经济、政治大国中的天皇外交[D]. 武汉: 武汉大学, 2004: 1.
- [7] 首相官邸. APEC 首脑会议出席等 2 日目 [EB/OL]. (2017-11-11) [2018-02-18]. 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1711/11apec.html.
- [8] 外務省. 日中外相会谈 [EB/OL]. (2018-01-28) [2018-02-18]. http://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3693.html.
- [9] 外務省. 李克強・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访日中日首脑会谈及び晚餐会 [EB/OL]. (2018-05-09) [2018-05-18].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0526.html.
- [10] 外務省. 外交青書[M]. 平成 4 年版. 東京:大蔵省印刷局, 1993: 188-189.
- [11] 光祥. 日本天皇访华始末[J]. 党史纵横, 2008(1): 48-51.
- [12] 毎日新聞. 退位特例法成立 18 年末にも皇太子さまが新天皇に即位 [EB/OL]. (2017-06-10) [2018-02-18]. <https://>

- mainichi.jp/articles/20170610/k00/00m/010/041000c.
- [13] 城山英巳. 中国共産党「天皇工作」秘録[M]. 東京: 株式会社文藝春秋, 2009: 12.
- [14] 島田政雄, 田家農. 戦後日中関係五十年——日中双方の課題は果たされたか[M]. 東京: 東方書店, 1997.
- [15] 宮内庁. 皇太子殿下お誕生日に際し(平成26年)[EB/OL]. (2014-02-21) [2018-02-18]. <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2/kaiken/kaiken-h26az.html>.
- [16] 杨振亚. 我所了解的德仁皇太子和他的平民妻子[J]. 世界知识, 2002(16): 42-43.
- [17] 宮内庁. 第3回国連水と災害特別会合における皇太子殿下ビデオ基調講演[EB/OL]. (2017-07-20) [2018-02-18]. <http://www.kunaicho.go.jp/page/koen/show/1>.
- [18] 防衛省・自衛隊. 平成29年版防衛白書[R/OL]. (2017-09-15) [2018-11-25].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7/html/nd100000.html>.
- [19] 防衛省・自衛隊. 平成30年版防衛白書[R/OL]. (2018-10-01) [2018-11-25].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8/html/nd100000.html>.
- [20] 首相官邸. 第23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晩餐会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EB/OL]. (2017-06-05) [2018-11-25].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
- [21] 杨振亚. 忆明仁天皇即位盛典[J]. 世界知识, 2002(15): 40-41.
- [22] 杨振亚. 既是葬礼, 也是外交——我经历的裕仁天皇葬礼和“葬礼外交”[J]. 世界知识, 2002(14): 40-41.
- [23] 陈鸿斌. 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写在日本天皇访华前夕[J]. 国际展望, 1992(1): 3-4.
- [24] 佚名. 天皇访华的背后[J]. 国际新闻界, 1992(5): 17-18.
- [25] 宮内庁. 中華人民共和国ご訪問に際し(平成4年)[EB/OL]. (2013-06-26) [2018-02-18]. <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gaikoku/gaikoku-h04-china.html>.
- [26] 五百旗頭真, 伊藤元重, 薬師寺克行. 90年代の証言宮澤喜一 保守本流の軌跡[M]. 東京: 朝日新聞社, 2006: 53.
- [27] 宮内庁. 天皇陛下お誕生日に際し(平成17年)[EB/OL]. (2013-07-01) [2018-02-18]. <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kaiken/kaiken-h17e.html>.
- [28] 宮内庁. 全国戦没者追悼式 平成27年8月15日(土)(日本武道館)[EB/OL]. (2015-08-15) [2018-02-18]. <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okotoba/okotoba-h27e.html#D0815>.
- [29] 池井優先生還暦記念論集刊行委員会. 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国: 友好と摩擦の現代史[M]. 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95: 241.
- [30] 外交部. 2017年12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 (2017-12-01) [2018-02-18].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515792.shtml.
- [31] 針生誠吉, 横田耕一. 現代憲法大系 1 国民主権と天皇制[M]. 東京: 法律文化社, 1983: 155.

(责任编辑: 韩 玮)